

年少早读苏东坡，为成长点亮明灯

□祁智



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
汪维宏 译
2024年11月
译林出版社

有关苏东坡的作品不少，我因为喜欢苏东坡，大部分读过。一个认真的作者，假如没有十二成把握，不敢“碰”苏东坡，因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实在太多，作品不能有一点“瑕疵”。因此，市面上的“苏东坡”虽然各有千秋，水准都不低。

在众多的“苏东坡”当中，我要特别提到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。

顾名思义，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的阅读对象是少年。

一个问题。少年需要“早识”苏东坡吗？当然需要。

苏东坡之所以是苏东坡，在于他的“实”，比如在诗词、书法、美食、为官上的成就，也在于他的“虚”：比如处世、境界、世界观等等。虚实结合，虚实并进。这些，少年迟早要“识”、迟早会“识”。既然如此，宜早不宜迟。当然也可以不那么迫切，迟一点无妨。但是有一点又不能迟，即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成为苏东坡的。一夜之间成不了苏东坡，苏东坡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。

少年苏东坡并不“高大上”，反而“接地气”“亲民”。他和其他调皮的男孩子一样，带着弟弟和小伙伴一起和泥、爬树、掏鸟蛋。因为贪玩完不成作业，而担心父亲的责怪。苏东坡在改正缺点上表现得很不错，谁还没有调皮捣蛋的少年时候呢，但并不是每一个少年都能及时纠正错误。少年苏东坡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年少立志，有了远大的志向，他在学习上自律的。这是他有别于同龄人的根本原因，也是他成为“苏东坡”的坚实基础。少年苏东坡和所有的少年一样，有家乡、亲人，有学堂、求学，有顽劣、醒悟，有立志、发奋。少年苏东坡对成长中的少年来说，可亲、可学。这个苏东坡的成长是少年成长的一盏灯，是一个榜样。少年如果“早识”苏东坡，对健康、快乐、卓有成

效地成长，益处良多。

再一个问题。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值得少年“早识”吗？我以为值得。

写苏东坡，至少有六条线。一条是人生、一条是为官、一条是精神、一条是诗文、一条是情趣、一条是时代。人生艰难曲折、宦海波涛汹涌、精神旷达豁然、诗文光辉灿烂、情趣生动盎然、时代风云变幻。这六条，每一条要写好都不容易，但是要写好苏东坡，六条必须齐头并进、互相交织，不可或缺。而把这些写出来，让少年“早识”，更为不易。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并不因为读者对象是少年，作品就可以降低层次、偷工减料，而是最大程度在构思、选材、表达和情绪上下功夫，使之适合少年阅读。谋篇不能笨拙，内容不能减少，表达不能干巴，情感不能直露。苏家历史、嘉佑二年科举、凤翔初试、王安石变法、乌台诗案、贬谪与救赎、与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……必须要写，必须要写到的还有苏东坡走一路写一路的诗文。

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可以看到苏东坡的成长之路，还原一个真实的、有血有肉的苏东坡。比如刚到凤翔任职，他是骄傲的，没有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，被上司“立规矩”。好在他的上司是正直的，将他视作晚辈，希望能稍稍收敛锋芒。后来苏东坡与和他一起共事的官员大都能相处愉快，除了他本身乐天的个性外，与他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
“三苏”和王安石的过节一直是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作者在写作时，并不评判孰是孰非，而是用纪实的手法写出交往的经过。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敌对是政治立场的不同，属于君子之争。“乌台诗案”发生时，王安石还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多年后，两人在金陵再相见，王安石骑着毛驴早在岸边等候，苏东坡则帽子也来不及戴就急忙下船迎接，两人还互相开起了玩笑，两位名士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换一句话说，要把给成年人做的上等食材，做成少年喜爱、对少年有益的餐食，何其难。但是，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做到了，全面而有侧重，复杂而有简洁，泼墨而有收敛。这是作者以对少年的体贴，表达对苏东坡的敬重。

还有一个问题。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能让少年“早识”吗？我的回答是可以的。

多年前，我在编辑黄蓓佳的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、曹文轩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时，提出“优秀的儿童文学适合一家人共读”，后来，我把“儿童文学”扩大到“儿童读物”。少年如果要顺利阅读，必须过“三关”，一个是家长关、一个是老师关、一个是自己关。家长要给

孩子购买“这本书”的费用，老师要给学生阅读“这本书”的时间，少年要有阅读“这本书”的兴趣。“这本书”凭什么让少年读？家长和教师必须先读以检验。“这本书”怎么真正产生阅读效果？少年必须喜欢。因此，少年任何一个完整的阅读，这三关缺一不可。

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在“过三关”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。

作者心里有苏东坡。作者准备充分。仅拥有资料这一点来说，不仅丰富，而且很多是第一手。作者没少去图书馆，没少潜心典籍，没少搜寻历史，没少到苏东坡生活、工作的现场。因而，作者写起来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。尤其突出的是，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花了很多笔墨，写苏东坡是一个好官。很多“苏东坡”一般不涉及官场，因为官场不好写，比如，王安石与苏东坡孰是孰非？但是，写苏东坡怎么能不涉及为官呢？他首先是一名“好官”，为官是追求也是工作，而文学、书法、美食只是“业余爱好”。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时间脉络、时代脉络、为官脉络、生活脉络、心路脉络，一丝不苟，清清楚楚。

作者心里有少年读者。字里行间风光无限，笔下热爱如泉喷涌。面对苏东坡的厄运，作者同情、悲悯，但是不埋怨、不渲染。全书沉郁而昂扬、严谨而恢宏、纪实而畅想。作者不是有意、故意“正能量”，而是坚定地认为苏东坡就是“正能量”。苏东坡九死一生，为什么能活下来？因为他心里有爱，因为他周围有爱。其他不说，凤翔政治起步，遇到好上司；嘉佑二年科举，遇到好考官；乌台诗案后，遇到真朋友——即使“敌人”也保他一命。有爱就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有未来。苏东坡不死，才有“苏东坡”。

作者心里有成年读者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最初浪荡，后来发奋；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，一贯博爱、善良、正直，对子女既严格又宽容；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胸怀坦荡，让苏东坡“出人头地”……作者将为父母之道、为官之道、为师之道、为兄弟之道、为友之道，巧妙地交织在苏东坡的际遇之中，既有故事的生动，也有教育的深刻。履痕处处，让人不仅能会心一笑，也能掩卷有思，同时都能找到参照的标尺。家长为孩子、老师为学生把关的同时，也受到吸引与启发，这就让少年有了阅读的可能、增加了阅读的机会。

《年少早识苏东坡》的问世，为“苏东坡”增加了一个品种。这个品种有特色、有品质，不掺水、不糊弄，值得少年“早识”，也值得少年与成人“共识”。这是优秀作品应该得到的待遇，也是有责任的作者、有品质的出版社的追求。

时代浪潮下的 心灵回响

□高低



《斑马嘶鸣》
程文胜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4年11月

《斑马嘶鸣》遴选了程文胜30篇中短篇小说，以西码头小镇为叙事舞台，巧妙运用原生态的复刻、戏剧化的冲突以及魔幻化的虚拟技巧，细腻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、洋溢着浓郁时代特色的生活图景。读者在字里行间既能深切体会到时代的强烈脉动，更能感受到人性深处那份恒久的温暖与光辉。

政府小职员、女屠宰工、退役老兵、乡村教师、哭坟人……这些角色，犹如西码头小镇上的斑马，各自发出不同的嘶鸣，各自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力挣扎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。他们的故事，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，更是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映射，是对那些被时代洪流悄然淹没的平凡人生的深情回望与深切关怀。政府小职员在职场压力面前，依然坚守初心，捍卫正义；女屠宰工在生活的重压下，依然怀揣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；退役老兵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，不断追寻着心灵的慰藉；乡村教师则用知识的光芒，照亮着孩子们的未来之路……这些人物，用他们的实际行动，生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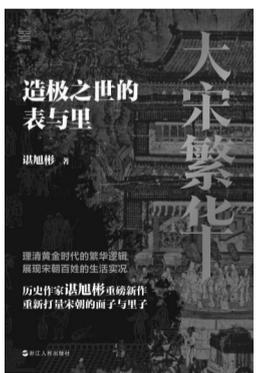
《斑马嘶鸣》在写实的基础上巧妙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想象，使得作品在质朴中透露出理想主义的光辉。程文胜的语言纯熟而富有张力，情感表达含蓄而深沉。他善于在细微之处着墨，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，细腻展现他们内心的波澜与挣扎。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，各有追求与坚守，他们的生命底色和命运轨迹，在程文胜的笔下被动勾勒出来，如同一幅幅精美的画卷，令人动容。

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苏轼的这句诗，或许是对《斑马嘶鸣》中人物命运的最好注解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与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有限生存空间中的情感抉择、生存危机与理想追求。他们随遇而安，以松弛自由的态度生活着，却也在人生的困顿中觉醒思考，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《斑马嘶鸣》不仅是一部深刻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力作，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时代镜像。它让我们在品味人物命运的同时，也对自己的生活与选择进行深刻反思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或许我们都应该放慢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找回那份被遗忘的纯真与梦想。正如斑马在西码头小镇上发出的嘶鸣，那是对生活的抗争，也是对未来的呼唤。

两宋的“金玉”与“败絮”

□禾刀



《大宋繁华：造极之世的表与里》
湛旭彬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2024年8月

近年来，关于两宋的中外著作汗牛充栋，绝大多数对两宋繁华极尽渲染。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以专攻宋史为著的德国汉学家迪特·库恩在《儒家统治的时代：宋的转型》一书中的观点亦颇具代表性，他认为两宋“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、最有教养、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，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”。中外知名学者的积极评价，构成了诠释宋史繁华鼎盛的主流叙事。

历史研究者湛旭彬爬梳剔抉，既从宏观数据方面条分缕析，逻辑缜密，又以具体案例解剖麻雀，丝丝入扣，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宋代。宋朝真的强大到足以笑傲全球吗？近

年来，时见一些论著搬出宋代经济规模。湛旭彬通过分析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论者对于宋代GDP评价之所以如此乐观，大都引用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的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一书。根据麦氏提供的副表，宋朝GDP占世界总量为22.7%，不及同时期印度的28.9%。如果再仔细阅读麦氏文章还会发现，麦氏著作中的中国不仅包括彼时的北宋，还包括辽、西夏、大理等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22.7%的占比还得多个地方细分。

今人对于宋代的一个重要“历史记忆”，往往与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文字与图画构成的繁荣盛景有关。湛旭彬研读大量史料后指出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，所谓的繁华盛景仅局限于开封、杭州等屈指可数的几座城市。这些城市看似商贾云集，热闹非凡，实际上不过是庞大食群群体养出来的虚胖假象。

湛旭彬指出，“两宋的繁华是一种汲取型繁华，而非发展型繁华”。在湛旭彬看来，繁华背后实为各种问题交织。百姓要想做生意，必须加入行会。行会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，是因为行会是官府摊派汲取的重要渠道：“官府会向城市居民‘科索’各种商品与劳役服务。为方便‘科索’，官府就强制要求商人成立行会”。加入行会，这是从商“路条”。换句话说，行会并不是常说的行业自治机构，更像是满足官府汲取的一种社会化组织。

宋代的交子与会子，在一些论著中常见被赋予“世界最早纸币”的骄傲式解读。湛旭彬指出，宋代特别重视钱币纳税比例，另一方面货币却供给不足，必然导致民间钱荒。为了完成官府下达的任务，人们不得不争持有限的货币，于是持币者待价而沽，商品价格下挫，层层传导，最终吃亏的还是生产源头那些经济基础更差的一线劳动者。

湛旭彬最后写道，“两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。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，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。或者说，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的繁荣；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。正如文彦博当日对宋神宗所言的那般，赵宋政权乃是‘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’”。两宋未能突破封建帝制的传统束缚，只是在秦汉旧制上进行了适度改良。

对于两宋繁华的结论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对比视角，一是同时期的欧洲，二是中华历史的纵深。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代，战争、疾病，各种矛盾与灾难交织，社会混乱，人口锐减，经济长期萎靡不振。相比之下，虽然长期须面对北方强大军事压力，但两宋社会平稳时期远较同期欧洲要长。此外，就中华历史纵深来看，相较于秦汉旧制，两宋儒税并不突出，社会商品流通更活，人口数量也是重要考量指标。认识两宋理需要更多视角，这或更利于我们作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。